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

FENGYULICHENG

风雨历程

—中国共产党认识与
处理资本主义和资产
阶级问题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全会
代表大会

• 吴序光 主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

FENGYULICHENG

风雨历程

——中国共产党认识与
处理资本主义和资产
阶级问题的历史经验

• 吴序光 主编 •

藏书专用章



西安政院201 2 0311488 3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认识与处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的历史经验 / 吴序光主编.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ISBN 7-303-05694-7

I. 风… II. 吴… III. ①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认识—研究②中国共产党—资产阶级—认识—研究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2344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 168mm 1/32 印张:24.25 字数:623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定价:3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2)
二、中共认识与处理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程	(6)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21)
四、新时期的私营经济	(41)
第二章 一道难解的题	
——初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59)
一、“向资本阶级开战”	(60)
二、不愉快的“第一次握手”	(83)
第三章 曲折后的沉思	
——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与新的转折.....	(115)
一、反对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16)
二、新认识、新转变.....	(156)
第四章 是敌还是友	
——划分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两部分.....	(179)
一、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走向成熟.....	(179)
二、解放战争时期关于没收官僚资本的思想与 政策.....	(221)

第五章 给私人资本定位

- 私人资本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社会 (241)
一、民主革命前途的新选择 (242)
二、从“新资本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校正 (272)

第六章 团结大多数

- 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305)
一、民主运动的曲折发展与统一战线政策的初步实践 (305)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资产阶级的新贡献 (319)
三、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与中共的支持指导 (324)
四、为和平民主奋斗与自觉接受中共领导 (340)

第七章 利用和限制

- 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轨道上 (355)
一、保护工商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355)
二、利用、限制的发展和深化 (370)

第八章 走历史必由之路

-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与历史评价 (416)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416)
二、和平赎买是良策 (433)
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454)
四、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486)

第九章 风雨过后有彩虹

- 改造后的曲折与新时期私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512)

一、曲折的历程.....	(512)
二、新时期私营经济产生的途径和发展情况.....	(528)
三、私营经济产生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	(546)
四、私营经济的发展规模和特征.....	(560)
五、有中国特色的私营经济.....	(572)

第十章 理论支点与现实舞台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营经济.....	(593)
一、私营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	(593)
二、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625)
三、私营经济的双重作用.....	(637)

第十一章 引人注目的社会新群体

——私营企业主和雇工问题.....	(653)
一、私营企业主的构成和属性.....	(653)
二、雇主与雇工关系探微.....	(671)
三、加强对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的教育管理.....	(683)

第十二章 走向何方

——私营经济的管理与发展趋向.....	(704)
一、私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及症结.....	(704)
二、促进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	(718)
三、私营经济的发展趋势.....	(724)

大事年表.....	(739)
参考书目.....	(763)
后记.....	(768)

第一章 緒論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9年的18年中，党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道路，指出：“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总之，“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①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面对的问题之一是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关于如何客观地认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正确处理好同他们的关系。这是决定党的政治路线的一个十分 important 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既有成功的历史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但也走过弯路，以致一个时期的国民经济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05页。

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影响了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论在民主革命阶段或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内，“左”的错误都曾经是党内反复出现的一种主要错误倾向，给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和损失。这类“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内容，常常表现在如何历史地全面地认识和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问题上。系统深入研究这种复杂的关联及其经验教训，是本书的主要任务。

一、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旧中国的资本主义，有外国在华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三种形态。外国资本是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其和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各种特权，凭借其雄厚资本和技术优势，在中国开办的外资企业。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对中国由商品输出为主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在中国建厂、开矿、筑路，投资迅猛扩大。这部分资本在中国产业资本中所占的比重，由 1894 年的 44.5% 上升到 1936 年的 57.8%。

官僚资本，最初是清朝政府洋务派官僚创办的军用工业，随后又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开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和近代交通运输业。辛亥革命后，特别是 1927 年以后国民党统治时期，主要是采取国营或公营的形式直接经营企业，走上了由金融垄断到工业垄断之路，并实现了国家垄断。在全国近代工业和交通业资本中，官僚资本的比重，1894 年为 39.1%，1920 年降至 26%，1936 年增长为 35.9%（不包括沦陷的东北地区），1947 年至 1948 年，增长至 64.1%。在金融业中，1894 年还没有官僚资本，1936 年则已占 58.9%，1947 年至 1948 年，猛增长到 88.9%，是官僚资本的顶点。

(一) 民族资本主义

民族资本，也称民营资本，是夹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之间的资本。产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落后的旧中国，开始应用近代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逐步形成一定规模的社会化生产的一种新型生产方式，是在封建国土上萌生的一个新芽。当时外有资本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和压迫，中国正一天天地沦为半殖民地；内有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重压，经济落后，民不聊生。而伴随外国入侵和统治阶级的洋务运动而产生的买办势力和洋务派，对新生的民族资本主义也极力扼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困难重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生不逢时，又缺乏基本的生存土壤和气候，只能在夹缝中挣扎，在各种挤压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因而注定其时运不佳，命途多舛。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比起封建地主经济和分散的个体经济，具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是向封建落后的农业经济进行挑战的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它既然已经破土而出，应运而生，就必然以先进的生产力推动中国社会前进。何况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符合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政治民主，使国家近代化的强烈愿望，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进步因素。

中国民族资本，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甲午战争前，是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建时期。据黄逸峰等著《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载：“据估算，至 1899 年为止，民族资本所办近代工矿企业约共 180 家，原始资本总额约计银 470 万两”。^① 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民族资本迅速发展时期。民族资本的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由 1992 万元增至

^① 黄逸峰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版，第 21 页。

28 741万元，增加14倍多，年增长率达13.3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打仗，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国家进口减少，出口增加，民族资本又有进一步发展。到1920年，民族资本约4.51亿元，是官僚资本的3.9倍，已接近外国在华资本（约5亿元）。1936年，关内的民族工业资本有14.48亿元，是官僚资本的4.3倍，相当于外国在华的工业资本（14.51亿元）。民族资本依靠自身的努力，聚集了超过官僚资本的工业资本，说明民族资本在市场竞争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抗战时期，大片中国国土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掠夺霸占，控制交通，垄断原料和市场，进行严厉的市场统制，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深渊。沦陷区一部分民族工业企业迁移到后方，对支援抗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因为国民党政权实行经济统制政策，由于官僚资本凭借特权，大肆扩充，形成国家垄断。所以在主要产品的产值中，民族资本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38年的78.8%降为1944年的46.3%。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渴望在经济上大展宏图。但美国货的倾销和官僚资本的垄断，使民族资本受到严重摧残，关门倒闭者越来越多；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大多数工商企业喘不过气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衰败之中。1947至1948年，民族资本的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抗战前1936年的78.6%。这时，在全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11.2%，官僚资本占64.1%，而民族资本只占24.7%。^①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把民族资本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完全陷入了困境。

（二）民族资产阶级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中国产生了两个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阶级。

^① 转引自李定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绪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5~11页。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既受外国资本的压迫，又有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官僚资本的挤压，因而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在旧中国始终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个软弱的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它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既有一定的革命性，又有妥协性。“实业救国”是这个阶级的理想，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爱国主义始终是他们的主流，要求民族独立，实现关税自主。这个阶级在政治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提倡改良主义，主张维新变法，到领导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从左右摇摆的中间力量，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渐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从参加恢复国民经济和经济建设，到被挟着进入社会主义。这些大体上都是同国家民族共命运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各个阶级中，是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受过西方教育，能够以较广阔的视野来分析和处理经济与政治等问题。他们为了求生存，图发展，比较重视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政治学说，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相当明确。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发展新式工业以挽救民族危亡。在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民族工商业遭到沉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再度表现强烈的爱国热忱，政治态度有了显著变化。他们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其“改弦更张”；开展废止内战运动，部分急进人士还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在抗日民族战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他们中有直接参加抗日部队的，有捐款、捐物，救护伤员的。特别是上海内迁工厂的壮举，为内地工业发展，为在军需民用上支援抗战奏响了一曲壮志凌云的爱国歌。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并积极投身于民主宪政运动。他们赞成共产党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抗战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要求“使一切企业家得到自由竞争的平等机会”，要求国民党政府以民主方式制定国家经济的发展计划，反对官僚资本垄断，保障私营企业的经营自由。在政治上，同全国人民一道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在建什么样国家的问题上，主张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实现英美的多党议会制、内阁制。1946年1月政协会议的召开，一度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舞台。但是国民党蒋介石迅速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的倒行逆施，促进民族资产阶级醒悟，使民主党派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是软弱的，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常在政治上表现动摇和妥协。他们没有形成纲领完备，组织严密，富有战斗力的政治集团，这就注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成为左右中国前途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追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向往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却是他们长期为之奋斗的理想。如何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支持鼓励其发展，实行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如何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处理好同它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好的重要问题之一。

二、中共认识与处理民族资本主义 和资产阶级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片面到比较全面，由一般理论概念到逐步符合客观实际的过程。它是党从实际出发，收集掌握有关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丰富材料而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也是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实践经验逐渐积累和成熟的结果。

(一) 从敌到友的认识转变

早期共产党人，主要从抽象理论和既定概念出发，把民族资本家作为革命的对象，看成是敌对阶级，认为他们是寄生虫，是外国资本家掠夺压迫中国人民的帮凶。从1923年起，开始把资产阶级分为反动的、不革命的、革命的等几个部分。可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后，对整个资产阶级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只是到了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运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把资产阶级分为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指出中产阶级的右翼可能是敌人，左翼可能是朋友，但要时常提防他们。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中共领导机关中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是右倾的，而在实际工人运动中却出现了“左”的倾向。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必陷于危险，自动放弃了革命领导权。而当时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工人运动，往往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采取过激的斗争方式，劳资纠纷处理方式不当，工人店员的工时没有保证，激化了劳资矛盾。这个时期对资产阶级的指导思想缺乏战略考虑，大都是依据具体事件进行分析判断，确定对策，因而容易左右摇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蒋介石、汪精卫都定错了阶级属性，想在统一战线中以妥协退让维持局面，谋求团结，结果导致革命失败。

1927年，在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党断定整个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成为一帮反革命派了。由于国民党的反共屠杀政策引起的仇恨，也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因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一再犯“左”的错误。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产生混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主张民主革命要急转直下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定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对其实行极端政策，甚至没收城市中等商人的商店

企业，使革命根据地的私营工商业陷于困境。结果没能孤立真正的敌人，反而孤立了自己。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惨痛的教训之一。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继续进行探索，认识有一定提高，但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却存在着矛盾。比如党提出了“保护私人工商业”，认为“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可是又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规定“系统的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把民族工商业者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富农等放在一起，规定不得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而且要把“经济恐慌的重担加在富农资本家身上去。”这既违背了民主革命的基本要求，也表明党的纲领路线与具体政策处于相互矛盾之中。当时在根据地实行压制和打击私营工商业的一系列政策，如在劳动政策方面，过高的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使私营工商业难以维继；以资本定税率的过高征收，使资本家无利可图。“左”倾路线是理论脱离实际，把一些主张当成宣传口号，同实际做法完全脱节。

在“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发表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我们的经济政策》，正确地提出“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①只是限于环境和历史条件，毛泽东仅原则地谈了包括个体经济在内的私人经济，没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做进一步的具体探讨。倒是张闻天、陈云等其他一些负责人做了一定研究。张闻天谈到，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对于我们并不是可怕的。它可以增加苏区内的生产，流通商品，而这对于苏区政府是极端重要的。这就要鼓励私人资本家投资生产，要使他们有利可图，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3页。

不是亏本。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资本家，他的投资是为了亏本。^①

到了 1935 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党在这方面的理论和政策才进行了调整和转变。会议的决议和会后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特征，对这个阶级的两面性，第一次作了系统的论述；对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了精辟的分析。这是中共成立以来将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理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的标志。从此以后，党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跳出“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切实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正确结合起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构成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一面仍然估计不足，认为其左翼有参加民族斗争的“可能”，其主体可能从动摇转为中立。可见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还要继续进行艰辛的探索，在政策上体现真正的转变，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二）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

毛泽东在 1948 年 9 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②这是因为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互相渗透和消长变化的情况。它们的分野有时不是那么清晰，有的企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家也有升有降，有沉有浮。我们又缺乏必要的准确的材料。

在瓦窑堡会议时，蒋介石是被作为“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是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没有把他放在统一战线之列。1936

^①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8 月版，第 25、26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版，第 140 页。

年以后，随着“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政策的提出，问题变得复杂。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能同地主买办阶级联合吗？回答是否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改变了对蒋介石集团阶级属性的认识，一度把国民党看成是资产阶级政党，把南京政权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以解决理论与实际工作的矛盾。这时中共的文件和负责人的讲话，常常是把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产生这种情况，首先是对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中尚未完全区分清。其次，从长期对抗转到联合，不仅仅是政策上的转变，而且需要有理论上的阐述和全党思想上的转变。这要有一个过程，一时认识不准或不全面是难免的。当时，还有共产国际影响这个因素。

中共的政策在调整和转变，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也在变化，而这又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关系到抗战的胜负。因此，抗战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深入研究，全面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做出了理论上的概括，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

1939年秋起，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的特点、历史地位和作用。指出：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历来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在1927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一直是“反对革命人民的”。^①只是因为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在革命主要地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下的买办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74页。

时期内参加当前的反帝战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又没有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但他们基本上没有掌握过政权，又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政策的限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毛泽东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①

区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问题。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中共已明确认识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是党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并形成一整套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他们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在大力发展党领导的进步势力的同时，努力争取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以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个反动势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及其巨大成功，证明这个区分和区别对待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从抗战后期起，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根据当时的实际和革命斗争的需要，进一步把大资产阶级定名为官僚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673 页。